

近代西洋汉语语法学术规范是怎样形成的

——从傅尔蒙、雷慕沙到甲柏连孜

姚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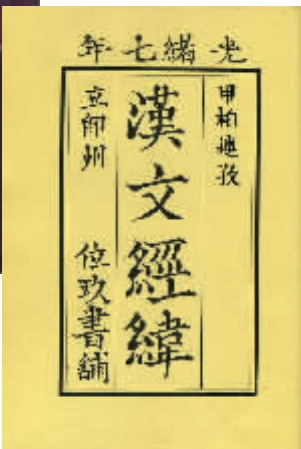
经过傅尔蒙语法事件,以及雷慕沙的批评和被批评,征引举例的规范也就逐渐成熟了起来。在《汉文经纬》上,甲柏连孜对引用的所有例句都注明了出处,可以说无一例外。有些例句不是直接引自中国典籍,而是取自他人的语法著述,碰到这种情况他就会说明转引自某人。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批评和改进,到了甲柏连孜,西方汉语语法研究的著述规范已告成熟。

摆在诸位面前的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汉文经纬》(Die 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中译本,有两个附录:“论汉语新语法”(1882)和“《汉文经纬》续论:庄子的语言”(1888)。前一篇很短,是甲柏连孜对《经纬》所做的自评;后一篇较长,从标题可知这是他的一项后续探索。收入这两篇作品,是想让中国读者看到:在完成这部古汉语语法之际,著者在思考些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跟这部语法有关的研究,他还做了些什么?

本文则打算把考察的视线往前推移,到甲柏连孜开始构思《汉文经纬》的时候。像这样一本大部头的语法,系统性如此之强,想必著者早早就有所谋划,提出若干相关的理念和方法,构想一个可操作的框架。当然,在准备阶段他还得做一件事情,即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加以清理,比较各种旧著



甲柏连孜与他的《汉文经纬》(1881)封面



的短长,看看哪些须摈弃,哪些尚可供汲取。于是我们要回到1878年,那一年甲柏连孜撰成一篇长文《论汉语语法学史和汉语语法研究理论》,刊发于《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

32卷(Gabelentz 1878)。文章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篇史论,标题为“文献史”(Literaturgeschichte),评析了之前两个世纪里18位研究者的20余部语法著作;第二部分题

作“汉语语法研究的任务”(Aufgabe der grammatischen Behandlung des Chinesischen),可以视为一篇规划书,提出了未来几年研究和著述的设想。

这里我们只来看此文的史评部分,并且只讨论其中谈及的一个方面,即举例征引的问题。这个问题跟汉语语法研究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说,也不那么重要,因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今人撰写论文、专著,引用例证时随手标明文献的出处,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两三个世纪以前人们还做不到,或者刚刚开始这样做,所以甲柏连孜当年回顾汉语语法研究史,把这一问题看得很严重,对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提出严厉的批评;而等到他自己撰著《汉文经纬》,在处理例证、说明出处时便格外小心。从雷慕沙指认傅尔蒙

(Stephanus Fourmont, 1683—1745)暗中剿袭,到甲柏连孜批评雷慕沙公开袭取——正是通过这样不断的批判、评析、改良、修正,语法家们举例征引的方式才得以逐渐规范起来。

甲柏连孜怎样评说傅尔蒙

甲柏连孜的述评从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的《华语官话语法》讲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西洋汉语语法的印本(Varo 1703)。可是甲柏连孜坦陈,这本语法书自己并未读过。原因很简单,其存本已经罕见,他未能弄到手。由于没有读到,他也就不予置评。我们从《汉文经纬》可以看到,甲柏连孜是一位脚踏实地、异常认真的研究者,

(下转6版) ➔

◀ (上接4版)

以凭良心确信,我认为在这一领域可圈可点的成就并不多。对于一些次要的东西人们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影响对于根本东西的公正判断。我很遗憾不能让您高兴,您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不利的评价。

硕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自1833年起在柏林大学讲授汉语和中国哲学的课程,1838年他获得“汉语、鞑靼语及其他东亚语言专业”编外教授的职位。在当时,硕特可能是唯一能从语言和哲学两个方面对甲柏连孜的论文做评价的德国学者。在1876年5月17日甲柏连孜写给妹妹的信中,他对硕特予以了很好的评价。甲柏连孜写道:

8天前我在柏林访问的硕特教授。这位尽管已经老了但依然精力充沛的先生对我充满了善意,并且也很理解我的志向。

在当时的德国,并没有很多学者能对甲柏连孜的题目做适当的评价。尽管硕特对甲柏

连孜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甲柏连孜不仅不以之为忤,反而欣然接受了。《荀子·修身》篇中有一句话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我想,所说的正是甲柏连孜此时的情形。

结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

除了早年的博士论文外,甲柏连孜对中国哲学的兴趣非常大,其后涉及中国哲学的文章有:《道家著作文字》《论中国哲学家墨翟》《盗跖——庄子中具有讽刺性的一段》《论中国哲学》。除这些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之外,甲柏连孜还为《科学与艺术普通百科全书》(Ersch u. Gruber, 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撰写了一些词条,其中包括“孔子”和“老子”。可以看出,甲柏连孜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是贯穿整个一生的。

甲柏连孜一生中研究过多种不同的语言,他的目标是通过汉语等具体的人类语言研究,进入对语言的本质的认识。他问道:

人们会问:观察这样一副色彩斑斓的图景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了解了整个地球上一定数量的语言,那我所拥有的和一间古董陈列室有什么差别?它们内在的联系在哪儿?科学性又在哪儿?……现在我问我自己:这种语言能力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难道不是得通过语言学来给它下个定义吗?但是如果我们还未来将语言发展的所有可能性都了解一遍,又怎么能给它下定义呢?

因此,甲柏连孜认为,只有当所有的人类语言都被研究过之后,人们才能掌握语言学的基本规律。而进入任何一种语言之中,都必然要与这种语言的哲学、历史、宗教打交道。因此,甲柏连孜的逻辑是从语言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终的目的是再回到普通语言学的研究。甲柏连孜指

出:“只有当一种语言构成我们的一部分‘自我’时,我们才能够评判它的优点和缺点。”

令人扼腕的是,甲柏连孜仅活了53岁,但他在1878年的就职演讲中却展示了他的雄心壮志:“为了掌握人类语言财富全部的可能形式,我们必须认清一切语言的发音、词素和句法手段以及每个个体面对逻辑和心理要求时的行为。”这一抱负的一部分,经过他对中国哲学和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得以实现。他指出:

显然,要实现这一点,只有对所有,或者说传统观点中所有更重要的语言进行穷尽性的语法研究。而研究单个语言的任务拥有再高的地位也不为过。我们自己的语文学历史就是证明;我们只需想想在拉丁语语法变成现在的状态之前所需的,那长达百年的准备过程。构建语言的每种形式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只适合自身的表达方式。

正是通过对汉语等语言的研究,使甲柏连孜认识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普遍现象,

为语言学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论、模式和方法。反过来,正是依靠普通语言学的这些共性,使他认识到长期演变而来的历史语言学,如古代汉语的语法“需要一个特殊的、只适合自身的表达方式”。而这一方式便体现为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一书。

在文化的碰撞、交流、互动、影响中,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历史事件都必须在一个超越了自身的抽象的普遍性基础之上,在与具体的现实关系之中,被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再次作理论上的阐述。不然,对这些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只能被作为一种特殊性或局部的东西来理解。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只存在于它与普遍性的关系之中,如果没有普遍性,特殊性也无法成立。理解《汉文经纬》,离不开他的《语言学》;而要深入领会甲柏连孜语言学的真谛,同样也离不开他的中国哲学研究。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教授)